

中东发展中国家 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透析

徐长泽

内容提要 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对中东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影响重大。两者关系可以归纳为 5 类：一党独大管控军队型、多党执政军队“中立”型、多党（派）武装并存型、君主及家族管控军队型、宗教领袖管控军队型。政党（政权）对军队通常采取从思想上、组织上管控，以及利用权威主义传统和给予较高待遇等方式进行管控。不同类型的两者关系对政局稳定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需要进行具体辩证分析。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可以预见这些国家管控军队的主体、管控军队的方式、军队干政的可能性和军队性质将随着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而随之发生变化。

关键词 政治制度 军事制度 发展中国家 中东

作者简介 徐长泽，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少校（北京 100091）。

中东国家大多属发展中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它们面临的内忧外患，军队作为现代化有组织的武装，对中东政局的影响举足轻重。据统计，20 世纪中东历史上曾有 17 个国家先后共发生过 60 余起军事政变（含数起重大未遂政变），¹ 大多数国家面临较大的潜在政治压力，^④ 给政局带来深刻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中东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的类型

中东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权）与军队的关系同各自国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受政治制度影响和不同时期政治格局的演变，在中东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上，也有较大区别，大致可分为下列 5 种类型。

（一）一党独大管控军队型

此类国家的军队由一党管控，禁止或限制其他组织干预军队。比较典型的国家有纳赛尔时期以来的埃及、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叙利亚等。1952 年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组织进行革命后，宣布解散一切政党，建立一党制军人政权，军队渗透到内阁。在萨达特上台以后，埃及逐渐允许反对党存在，但多次镇压反对派，到目前为止，仍实行一党（民族民主党）独大的有限多党制；民族民主党主席穆巴拉克任总统，对武装部队实施领导。伊拉克军队曾于 1958 年和 1968 年为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夺取了政权。萨达姆上台后，视军队为巩固政权的支柱和称霸阿拉伯世界的基础，十分重视军队

¹ 参见王京列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6 页。

^④ See James A. Bill/Carl Leiden,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Canada: th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83 p. 262.

的发展与建设，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复兴社会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控制。

（二）多党执政军队“中立”型

这类国家允许多个政党存在，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军队一般在法律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演化为政局的积极干预者，当政局发生动荡或危机时，军队发动政变或进行干预，待政局稳定后复归文官统治。此类国家中土耳其较为典型。1946年，土耳其允许建立反对党，1950年大选中，实现政党轮流执政，但由于上台的民主党推行专制统治，1960年军人发动政变，使多党制重新进入基本正常的运作阶段，但仍不时受阻，需要军方出来帮助维护和校正。

（三）多党（派）武装并存型

这类国家政权控制力相对较弱，国内政党（派）林立，且各自发展武装力量，维护各自的利益，造成国家政局动荡，冲突不断。比较典型的有现在的伊拉克、苏丹、黎巴嫩、前阿富汗及巴勒斯坦等。伊拉克政府拥有一部分武装，但其3个主要派别也有相当的民兵组织和武装力量。苏丹政府军与加朗集团的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内战始于1983年，20多年中兵戈相见。前阿富汗伊斯兰政党、伊斯兰促进会、塔利班等也是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政党组织。

（四）君主及家族管控军队型

此类国家多为君主制国家，军队由国王及其家族掌控，国王往往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这类国家主要有巴列维王朝时的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制国家。

（五）宗教领袖管控军队型

这类国家宗教势力对政权影响较大，军队由宗教领袖控制，比较典型的国家主要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霍梅尼发起革命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体系，但伊斯兰势力占支配地位，宗教领袖超然于三权之上，法基赫牢牢掌握教权、军权，军队成为直接贯彻宗教领袖意志的得力工具。总统权力有限。

政党（政权）对军队管控的主要方式

中东地区由于国家政治制度比较特殊，多数国家处于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时期，因而政党（政权）对军队的管控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从思想上影响军队

中东发展中国家注重用于己有利的宗教、民族意识等意识形态教育影响军队。例如，伊朗特别重视军队伊斯兰化，伊朗宪法规定：“伊斯兰共和国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伊斯兰军队，即忠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必须由赞成伊斯兰革命的目标并准备为实现这些目标献身者组成的军队”。向军队派遣教士进行政治意识形态指导是保证军队伊斯兰性质的关键措施，1984年夏，1.2万名教士被派往两伊战争前线的伊朗军队中。¹叙利亚复兴党执政伊始，就提出要建立一支有信仰的军队，使之成为复兴党实现“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纲领的支柱，叙军政治部接受司令部和复兴党总部的双重领导，负责全军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在基层配有负责政治工作的专职干部。伊拉克萨达姆时期强调要“根据复兴社会党的思想和原则及其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来建设军队”^④。

（二）从组织上掌控军队

在单一管控型中东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政权）、君主等通过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委任高级军官控制部队，且大都禁止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军队中活动。叙利亚复兴党在建党初期，就注重在军官中发展党员。1963年政变成功后，复兴党发动第二次夺权，将以逊尼派为人口主体城市的纳赛尔

¹ 参见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④ 高勤等主编：《叫板美国——伊拉克军情内幕》，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主义者和各类中立派军官清除出军队，并着手使军队彻底的复兴党化，由党的总书记任军队总司令，在师一级建立党委，营以上单位设复兴党基层组织，严禁其他党派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开展活动。阿萨德执政后，为防止军人搞政变，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来自阿拉伯复兴党和他的部落，与他关系密切的阿拉维派掌握着各级军事战略部门。伊拉克萨达姆时期，为保证军队对复兴社会党的绝对忠诚，禁止其他党派组织在军队中活动，使复兴社会党成为军队中唯一合法的党派组织。伊拉克军事学院只接收复兴社会党党员，且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多数军官都是复兴社会党党员，高级军官与萨达姆家族有血缘婚姻方面的联系。为加强控制军队，伊拉克五大情报机构人员渗透到军队的各个分支系统。在埃及萨达特时期，为消除苏联对埃及军队的渗透和监护，1972年驱逐了埃及军队中全部约1.5万名苏联军事专家。^①

（三）从体制上防范干政

为防止军人干政，不少国家确立了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制度。1923年，凯末尔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针对军队领导层中强烈的干政倾向，要求凡兼任议员的军人必须取消议员资格，不愿辞职的应放弃军职，又于1924年立法将总参谋部置于政府机构之外。虽然军队对政治事务的干预未能全然避免，但保证了自凯末尔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共和人民党的独立执政。叙利亚1930年宪法也禁止军人进入立法会议，宣称军队的职责在于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非介入政治。^④复兴党激进派掌权后，也要求高级军官必须服从党纪，禁止他们同时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以促使军队非政治化和职业化，实现军政分离。这些做法，从体制、形式上体现了军人不直接参政的原则，但从各国的实践看，军队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政治之外，总是以各种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

（四）利用权威主义传统进行管控

20世纪上、中叶，在中东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杰出领导人物，他们以卓著功勋奠定了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较强的权威。如埃及的纳赛尔，长期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和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赢得崇高威望。土耳其凯末尔领导人民战胜了侵略者，废除了奥斯曼帝国苏丹体制，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也在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中取得了领导权。此外，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伊拉克的萨达姆等，以革命的合法性在军队中享有不可置疑的领导权。中东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叙利亚、也门、埃及等）执政的首脑人物都是军人或军人出身。他们多数是通过政变上台执政，后来还政于民，如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有的是通过合法继承，如现沙特国王和伊朗的宗教领袖等，因而也具有一定的领导权威。他们以这种特殊权威对军队实施集权领导。

（五）给予军人较高的政治、物质待遇

政党（政权）通过给军队较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使军队听命于该政党（政权），特别是一些通过选举或由军队支持而上台的政党，由于对军队缺乏管控能力，往往采取提高政治、物质待遇来稳定军队。土耳其1960年军人政变后，第二年建立了联合政府，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担心军人再次夺权，迎合军人要求，先后推选军方领导人古尔塞勒和苏奈出任总统，同意建立国家安全会议，为军人参政创造合法途径。颁布的新《军人法》明显地改善了军人生活条件。通过军人互助协会，8万军官可将其部分薪金投资到最易获利的经济部门。退休军官被安排到政府外交等部门工作，或进入私企领导层，直至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埃及1952年7月自由军官政变后，军人入阁比较普遍，最高时期军人部长占65.4%，而且控制政府的关键职位，^{④⑤}埃及总统都出身于军人。约旦则每年都要拿出相当部分资金用于提高军队的待遇。

^① 参见陈建民主编：《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④ 参见王彤主编：前引书，第289页。

^{④⑤} 参见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对中东政局的影响

影响中东发展中国家政局稳定的因素比较复杂，有经济、政治、宗教、部族派别及大国干预等，但政党（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在对国内政局的影响上，有时往往与其他因素互动，政局动荡导致军人干政，或由军人政变引发政府更替。大体来说，有 3 个方面。

（一）对军队实施单一管控的国家，总体上政局较稳，但如长期保守僵化，易积累矛盾，埋下隐患

这类国家的军队由一个主体长期管控，包括前述一党独大管控型、君主和家族管控型、宗教领袖管控型。从中东现代历史考察，单一管控型国家军队和政局总体比较稳定，如沙特、约旦、阿萨德执政后的叙利亚、伊朗巴列维王朝及现在的伊朗、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埃及等，对军队管控较为有力，对一般性社会动荡能用暴力及时平息，国家政局大体上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叙利亚从 1946 年取得真正独立到复兴党 1963 年上台前，由于推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政权软弱，政局动荡，发生多次军人政变。复兴党建立一党统治后，由于党内派别斗争，局势再度动荡。直到阿萨德执政后，通过大力加强政权建设，建立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高度集中、严格控制的国家领导体制，确立了复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叙利亚自此保持了多年的稳定。从理论层面分析，由于军队和政权由一个主体长期管控，易形成一套管控的体制和经验，避免了党派分歧和交接转换期的动荡，有利于形成有力的中央政权和稳定的政局。但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过度依赖军队维持统治，多用压制手段，不愿兼顾其他不同群体的利益，有的甚至党内派系斗争不断，因而易积累矛盾，一旦爆发或失控，国家将陷入巨大动荡之中。从埃及情况看，纳赛尔建立一党制军人政权后，国家较之前的国王和 20 多个党派纷争的局面稳定了较长时期，且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但从历史上考察，从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 3 个时期，作为政局稳定的重要指标——政治暴力中的游行示威、暗杀、暴动、逮捕等明显增多，有时甚至动用军队平定骚乱。伊拉克在萨达姆时期，以高压手段保持了政局相对稳定，自他倒台后，社会陷入激烈动荡，虽然十几万联军进驻，也无法平息。而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更说明了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上的严密控制，伊朗社会表面十分稳定，但仅因 1978 年官方报纸一篇抨击霍梅尼的文章，引发全国性的起义。导致王朝统治灭亡的，不单纯是对突发事件处理不当，而是整个社会在专制统治下政治、经济、信仰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长期积累形成的严重结构性失衡的结果。

（二）多党执政军队“中立”型国家，易发生阶段性政治动荡和引发军队干政，但如能及时回归文官治理，则能对政局起到纠偏作用

此类国家中比较典型的是土耳其，早在凯末尔时期，两次建立反对党的尝试都导致社会剧烈动荡，政局不稳，政府被迫采取严厉措施，直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重新恢复一党制。1945 年后土耳其进入多党政治时期，军人面临继续支持共和人民党还是适应多党政治超脱于政治之外的选择。对于军队领导层来说，他们的社会经历、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同长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休戚与共。而通过 1950 年选举上台的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不顾已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恢复一党专制统治，封杀在野的共和人民党，国家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导致 1960 年 5 月军人政变，取缔了民主党，建立军人政权。1961 年，土耳其重新开放党禁，举行大选，勉强组建了多党联合政府，1962 年和 1963 年，由于联合政府的无所作为，又引发了中下级军官的两次军事政变，但由于军队上层与资产阶级主要政党关系密切，军事政变很快被平息。1971 年，由于多党政治及过分宽松的民主，使社会陷入动荡，军人又进行干预，对执政的正义党施压并要求修改宪法，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持社会稳定。1980 年，由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互相拆台和无原则的争斗，以及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泛滥，使土耳其政局再度混乱，军队高层在警告施压无效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再次建立军人政权，对资产阶级政体运行规则进行修正，政局稳定后于 1983 年重新把政权移交给以厄扎尔为首的祖国党政府。土耳其的情况表明，多党执政军队“中立”型国家，军队不仅没有超脱政治，反而是多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对稳定政局，保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发展起到了纠偏作用。¹ 但如果军队过于干政,不及时进行民主和政权建设,则陷入军人专制和政变的恶性循环中,^④如前述的叙利亚1949~1963年这段时期即是如此。

(三)多党(派)武装并存型国家,执政当局无法形成有力控制,各种力量分化变数较大,政局动荡

此类国家和地区,有两个以上的党(派)存在,各自有武装,且存在政治和利益上的巨大分歧,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政权,常发生武装冲突和袭击事件,政局较动荡。黎巴嫩的长枪党、真主党、“阿迈勒运动”等都是武装型政党,有大量民兵和重型装备,与政府、以色列及派别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苏丹内战持续20多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部巴希尔政府力图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南部,开发南部资源,而以基督教为主的南部在加朗集团的带动下,坚持开展人民解放运动,要建立独立的政教分离国家,公正分享经济政治权力,政府军与反政府的苏丹解放军不断发生冲突,人道主义危机不断。伊拉克除政府军外,逊尼派、什叶派及北部库尔德人都有自己的武装和组织,冲突和袭击事件不断。巴勒斯坦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分歧重重,在组建联合政府及巴以和平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不时发生内部冲突。

中东政党(政权)与军队关系演变趋势

近年来,中东民主进程在曲折中前行,中东政治经济不断发展,可以预见,中东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君主、元首、宗教领袖等个人权威主义对军队的管控将继续存在,但集团化、世俗化趋势明显

战后中东权威主义领导人致力于反殖、反封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抵御外侮等,也建立起个人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有的权威领导方式已内化为国家权力(包括对军队管控)的运行机制,具备了相对稳定性,所以,这种权威主义对军队的管控,仍将继续一段时间。但随着元老派统治者退出政治舞台,政治继承者面临合法性危机,同时权威主义的僵化,也使其渐渐陷入了困境。世界各国及地区民主化潮流已成为一种趋势。一些权威主义统治者也认识到如一味排拒政治改革、限制民主,就有可能被彻底推翻,因此,也采取了一些民主化措施。1989年伊朗修宪后,法基赫职位趋于世俗化,权威受到削弱,伊朗民选总统权力正逐渐扩大。总统可以通过新设立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参与军队管控。君主制国家也开始注重完善有限民主,阿曼、沙特和巴林先后成立协商会议,沙特还扩大了大臣会议的参与主体和权力。政党制度上也有所松动,大多数国家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科威特放宽了对政党活动的限制,埃及有限多党制也在逐步发展。可以预见,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入,新兴政治力量和新兴政党的壮大,参与政权、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会越来越强烈,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方向发展将成为必然趋势,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对其管控将随之向世俗化、集团化、国家化方向发展。但也不排除一些国家民主进程受到挫折、引发统治危机后,统治者通过强化对军队的权威统治,以强制手段维护统治秩序的可能性。

(二)执政党(政权)将更加关注对军队的管控,方式上将走向体制化和规范化

从中东一些比较稳定的国家来看,执政党(政权)都比较重视管控军队,把军队当做维护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与支柱,采取多种措施管控军队。如叙利亚、土耳其、伊朗等,都有一套管控军队的措施。从组织手段和方法看,大多比较传统和非体制化,利用宗派、家族、地域、个人权威、政治与物质利益关系等容易产生认同感和亲和力的传统社会纽带,以政治清洗、严密监控为防护手段,以“顺主忠君”、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来管控军队。随着中东政治现代化的进展,执政党(政权)也开始重视靠宪法、议会、政党、官僚机构、意识形态等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现代政治组织和思想对军队进行管理运作。对军队的管控和领导,更多将由宗教合法性、革命合

¹ 参见王彤主编:前引书,第53页。

^④ See James A. Bill/Carl Leiden op. cit., p. 262.

法性向宪政合法性转变。当下中东多数发展中国家宪法都规定国家元首是武装部队的统帅，还有的国家将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原则体现在法规制度方面。1989年伊朗宪法，也将霍梅尼的一些非正式权力制度化，并对军队的性质、任务做出规定。

（三）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会在强度和次数上减少

中东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历来有干预政治的倾向，不少共和制国家都先经历了军人政权，之后过渡到政党政治。军人干政的原因多种多样，如：缺乏制度化的政治调解机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和激化，激进的民主政体与欠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文化遗产不相适应；执政党专制、政策失误；军人反对的政党、组织、人物在选举中获胜；军人的特权、利益受到威胁或触动时，等等，都可能发生政变。但其根本原因与军队在前现代或正处于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有关。从组织性方面讲，军队由于其特殊的职能而成为各种社会群体中组织最严密、纪律性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且往往享有特权，并自成体系，特别是在政权脆弱的国家中，军队通常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而部分国家民主体制的虚弱性和无效性使政治参与更多地是通过体制外的途径进行，所以当民众及军人的政治参与热情无法整合到体制内时，局势就会动荡。军队作为民族主义情绪最高的社会群体，会比其他群体更容易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运用自身的权力参与政治，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军人干政就是在这种特定社会结构、社会背景下，通过非体制或反体制途径进行政治参与。¹从上述分析可见，当前中东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的一些潜在因素依然存在，如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军队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民主制度的缺失和权威政治在一定时期内的继续存在、少数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执政党的政策失误等，都会使军队有干政的可能。但由于当代中东与20世纪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军人干政的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受到削弱，如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威权政治在向现代政治发展，体制内的政治参与途径逐步扩展，政权更加注重宪政合法性等，可以预测，军人干政机率和强度将大为降低。

（四）多数军队随着政党（政权）阶级属性变化，将逐渐演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国家政权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鲜明的阶级性，必然随着政权及执政党的政策趋向而发生变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考察，中东发展中国家多数军队将随着政党（政权）阶级属性变化，逐渐演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20世纪上、中叶，中东刚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中挣脱出来，受苏联社会主义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基础，埃及、叙利亚等国纷纷进行土地改革，推行国有化或国家资本主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更替，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中小资产阶级逐步登上国家政治舞台，政权及执政党逐渐转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埃及萨达特执政后，全面否定纳赛尔实行的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引起了较大的社会震荡，埃及政党也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1977年甚至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因不满物价上涨而引发的骚乱。而叙利亚在阿萨德纠偏后，政权主要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国家官僚阶层的利益，但由于体制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特点，以及国家主义的盛行，资产阶级属性体现得不是那么鲜明。在海湾君主制国家，统治集团主要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包括王族高级成员及与王族关系密切的权贵及私商组成，军队显然是维护这些阶级利益的工具。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参见王彤主编：前引书，第40~54页。

The Political Party-Military Power Re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tates

Xu Changze

pp. 46– 51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military powers re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 are five kinds of the relations for them: military autocracy owned by one party, military remains neutral on mutual parties, mutual parties militaries coexistence, militaries dominated by monarch or clan and militaries controlled by religious leaders. The parties (political powers) often control the military powers through theory or organization, and they may also

give militaries better treatment depending on traditional authority. It's necessary to make analysis dialectically on this situation, for different relations may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stability. It may be predicted that the political powers to control military, the ways to manage the military, the possibility for military to interfere politics, an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may transform with the change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 states.

Chinese Broadcasting to Africa: Ideology and Strategy

Zhang Zhe

pp. 52– 57

The world broadcasting to Africa has great cha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China's broadcasting to Afric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es towards program native-orienting and increasing broadcasting frequency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corresponding media agencies in Africa.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CRI) has got highly

appraise from Africans officers and politicians, and the programs are welcomed by African people. Under new situation, CRI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broadcasting programs and make proper development strategy, so as to promote transportation in all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n Analysis on the Language Issue during the Nation-building in Nigeria

Li Wengang

pp. 58– 63

It is a difficult task for African states to establish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t is also hard to form the sense of self-identity and re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Nigeria is a multi-nationality nation with varied languages, and the issue of language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nation-building. The issue of language is beyond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mong tribes. The language issue in Nigeria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is how to define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is issue may last for a long time, and it may cause harmful consequence if it couldn't be handled properly.